

儒法斗争史简介(讲稿)

(供内部学习参考)

(1)-(15)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1974年七月

儒法斗争史简介（讲稿）

（供内部学习参考）

（5）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一九七四年七月

第五讲

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太平天国的討孔运动和近代儒法斗争的特点

从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开始，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历史上称为近代。这是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中国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本来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破坏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官办近代工业；八十年代，出现了民办近代工业。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为了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市场和原料基地，并控制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因此，他们反对中国的民族独立，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他们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随着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出现，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部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封建統治的斗争史。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統治，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从鴉片战争开始，中間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統治。

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討孔运动。

鴉片战争以后，由于清王朝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在短短的十年內，农民的負担增加了一倍以上，造成了“民不聊生，心皆思乱”（《天地会詔書》）的社会局面。一八五一年初，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他們把斗争的鋒芒，直接指向对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封建統治者。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洪秀全对孔老二和尊孔派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斗争。

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洪秀全就砸碎了他教書的私塾里的孔丘牌位，表明他蔑視封建权威，决心砸碎束縛农民的精神枷鎖，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为了制造革命輿論，他把革命农民和封建統治者的矛盾，抽象为“皇上帝”和“妖魔”的矛盾，并且用神話寓言的方式对孔丘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天父上主皇上帝撰列三等書指主看曰：……‘这是孔丘所遺傳之書，即是尔在凡間所讀之書，此書甚多差謬，連尔讀之，亦被其書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責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塗了事……’孔丘始則强辯，繼則

默然无辞。……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太平天国》）

这个故事说明，洪秀全认为：一、孔丘“教人之書多錯”，是不利于农民革命的；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是“妖魔作怪之由”，也就是封建統治者用来束縛压迫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三、孔丘这个封建統治階級的“圣人”，是應該鞭撻、打翻在地的。

恩格斯在《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中說：“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奉行的秩序的叛逆。”洪秀全对孔老二的鞭撻，就是对封建文化和封建等級制度的批判和声討。

太平天国在进军途中，拆毀孔廟，搗毀孔丘偶像，焚燒孔孟經書，把孔孟之道宣布为“邪說”，把儒家經典宣布为“妖書”，下令对孔孟的書“不准买卖藏讀”。洪秀全还向封建等級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旧礼教进行了挑战，他說：“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輩。”在太平天国地区內，妇女和男子一样，享有各项政治經濟权利，可以同样分得土地，参加政权管理和參軍作战。洪秀全提出了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要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飽暖。”洪秀全要求作到“无处不均匀”，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絕對平均主义幻想，但在当时，这确实反映了农民階級反对封建剝削压迫、渴望得到土地的革命要求。

总之，太平天国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声討，就是对旧中国束縛农民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大繩索的猛烈冲击。

太平天国的討孔运动，集中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智慧和要求，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剥削阶级所无法比拟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王充只能“問孔”，李贽只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象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样声討孔丘，确实是空前的。这是因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創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始终站在反孔斗争的最前列。在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揭露批判孔老二的，是奴隶起义領袖柳下跖。在封建社会中，首先批判孔孟的“天命論”、反对豪族特权的是陈胜、吳广，他們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反对君权神授观念，反对豪族世袭特权。在封建社会后期，首先批判孔孟之道的，是北宋时期的农民起义領袖李順、王小波，他們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革命口号，反对封建等級制度，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首先起来声討孔丘的，是农民革命領袖洪秀全。儒法斗争，是在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促进和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是这样，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是这样，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儒法斗争也是这样。

近代的儒法斗争，和以前的儒法斗争具有不同的阶级政治内容。从春秋战国到秦代，儒法斗争的阶级政治内容，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沒落奴隶主阶级間革新和守旧，进步和反动，反复辟和复辟的斗争。从汉代到鴉片战争时期，儒法斗争的内容，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从总体上說，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統一和分裂的路綫斗争。而近代的儒法斗争，則是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斗争。这个斗争，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各个領域。在經濟領域中，是阻碍

还是发展民族資本主义的斗争；在政治领域中，是维护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統治，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在文化领域中，是旧学和新学之争，也是中学和西学之争，即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斗争。总之，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統治，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則竭力维护他們的反动統治，这是近代儒法斗争的根本特点，也是近代儒法斗争的第一个特点。

跟这一根本特点相联系，在近代的儒法斗争中，如何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一直是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争论中，尊孔派既是守旧复辟派，又是妥协投降派。在近代，尊孔、复辟、卖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始終是三位一体的。这是近代儒法斗争的第二个特点。

近代儒法斗争的第三个特点是：近代法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軟弱。毛主席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軟弱性。”（《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发展資本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要求，但它又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因而他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具有动摇性、两面性。因此，作为近代法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反孔斗争中很不彻底。他們往往反儒不反孔，例如康有为就是这样。康有为主张变法革新，为了制造輿論，他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經考》。他在这两部書中說，当时流传的許多儒家經典，本来都不是孔丘的，而是后人假借孔丘的名义伪造的，因而是不可信的。但是，他却把儒家的祖始爷，孔丘吹捧为万世制法的通天教主，說他是直接繼承孔丘，推行变法革新的，并把某些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东西挂在孔丘这个所謂“圣人”的名下。总之，康有为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孔丘，反对

封建专制主义的孔丘，并且說：“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与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孔子改制考·卷十一》）不难看出，康有为是跪着造反的軟骨头，他反儒不反孔，正是中国民族資产階級的軟弱性的表現。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作为民族資产階級代表的近代法家，他們往往是半截反孔派。当他們反帝反封，要求进步要求革新时，他們反孔；当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他們保守倒退、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投降时，他們就尊孔，例如严复和章太炎就是这样。

近代儒法斗争的第四个特点是：法家的思想体系，除了繼承古代法家思想外，主要是吸收西方資产階級民主主义文化，即所謂“新学”或“西学”。儒家思想，不仅有傳統的孔孟之道，并且也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相結合，成为文化上的反动同盟。由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世界已进入了帝国主义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由于中国民族資产階級不可能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义、并且特別軟弱，因而他們没有什么象样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新民主主义論》）

近代儒法斗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戊戌变法时期資产階級改良派反对頑固派、洋务派的斗争。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时期資产階級革命派反对保皇派的斗争。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后資产階級革命派反对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

戊戌變法和資產階級改良派 反對頑固派洋務派的鬥爭

戊戌變法，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發起的一次變法革新運動。

早在戊戌變法以前，鴉片戰爭時期，龔自珍和魏源就曾提出革新要求，主張反抗外國侵略者，反對妥協投降派“恐觸外侮而生內變”的賣國論調。龔自珍要求改變當時貧富“大不相齊”的社會局面。魏源要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海國圖志》中，他贊揚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和美國的資產階級憲法，要求人們了解西方的情況，學習西方的長處，抵禦外國侵略者。

在龔自珍魏源之後，還有馮桂芬、薛福成、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但他們的主張和言論，還沒有廣泛深刻的影響，沒能形成社會運動。

一八九四年，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中國遭到了失敗，和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列強乘機要挾清政府統治者，圖謀瓜分中國。戊戌變法運動就是在中日戰爭失敗、列強圖謀瓜分中國的影響和刺激下形成發展起來的。這個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為、嚴復、梁啟超、譚嗣同等。

康有為（1858—1927年）號長素，廣東南海人。1895年中日戰爭失敗，他深感中國面臨亡國的危險，組織領導當時在京應試的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沒有結果。他前後多次上書皇帝，希望清政府改變專制體制，實行君主立憲；獎勵民間興辦新式工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但由於頑固派的

阻挠和反对，一直没有什么结果。他加紧对官僚、地主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宣传活动，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学会，出版报纸，宣传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梁启超是他的学生和最得力的助手。谭嗣同是他的追随者。

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闽侯人。青年时代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来到英国留学，努力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发表文章，主张变法维新。1895年，他开始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严复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启蒙思想家。

戊戌变法前，改良派的宣传活动，打开了议论时政的局面，对广大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1897年，德国用武力侵占胶州湾，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他强调局势十分危急：“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海内惊惶，乱民蠢动”，“揭竿斩木（人民揭竿而起），已可忧危。”他认为，清王朝如不变法，不被“强邻”吞灭，也会被所谓“乱民”推翻。当时，清政府统治集团确实感到局势危急，无法控制，因而康有为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密谈，光绪采纳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先后陆续任用了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即戊戌年）六月，光绪下令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是一次短命的革新运动。从六月到九月，光绪发布了数十道命令，如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办银行、设立铁道矿务局等等。但由于光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没有掌握实权，因而这些变法主张和命令始终没有实行，并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洋务派的激烈反对，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反革命政变。从下令变法到慈禧政变，先后共一百零三天，

所以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維新”。

慈禧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囚禁光绪，捕杀新党，附合赞成新党的人物，分别遭到了流放、革职和监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等被杀害。戊戌变法，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之间、革新和守旧、进步和反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儒法斗争，就是这场斗争的表现和反映。

顽固派和洋务派以张之洞为主要代表，尊崇孔孟之道，出卖民族利益，和帝国主义结成反动同盟，疯狂反对变法。围绕着变法和反对变法的斗争，资产阶级改良派同顽固派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变”和“不变”之争。

在这个问题上，改良派和顽固派、洋务派存在着根本分歧，也是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

顽固派和洋务派鼓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声称“祖宗之法不可变”。他们认为，即使中国灭亡，他们这些贵族大臣也不会失去特权地位，所以他们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徐桐）；当时的军机大臣满族贵族刚毅甚至说“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张之洞也声称，即使列强瓜分中国，他可以“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他们异口同声，坚决反对变法，准备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李提摩太，也大讲什么“上天仁爱，必将使中外一家，一合而不再分”（《新政策自叙》）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论证和辩护。

资产阶级改良派，批驳了顽固派、洋务派反对变法和卖国投降的反动论调。

康有为针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还说，人们从幼童

到老年，人的身体、容貌、顏色、神气，“无一不变，无刻不变”。（《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記事》）在他看来，变化发展是事物的普遍規律，所以他說，“变者，天道也”（同上），“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書》）駁斥了頑固派洋务派反对变法的形而上学观点，論証了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康有为主張，变法必須“全变”，而不能“小变”、枝枝节节的变。他說，“全变則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書》），反对洋务派所謂“中学为体，西洋为用”的主張。他請求清帝效法明治維新和彼得大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說日本和俄罗斯的君主，“一姓累敗而累兴”，是因为“善变以应天”；而中国各个朝代“一姓不再兴”，是因为“不变而逆天”（《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記序》）。他对光緒說：如果“一姓能順天，时时自变，則一姓虽万世存可也。”（同上）他警告那些頑固派和洋务派說：印度“守旧不变”，被英国灭亡，万年之后，才有一个印度人被“选充議員”。波蘭被瓜分，不但君主被胁，貴族和大臣全受凌辱。所以，中国必須变法，否則，“恐皇上与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上清帝第五書》）如不变法，国永不保，皇帝和貴族大臣們，就是想做老百姓，恐怕也办不到。总之他要用劝告和乞求的办法，請說服統治者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实现他們的变法主張和要求。

为了論証和要求变法，严复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他翻譯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用进化論的思想，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鐘。严复認為，“物竞天择”是支配世界的法則。所謂“物竞”，指生物間的生存竞争，所謂“天择”，指生物在生存竞争过程中，同周围客观环境相适应的就生存发展；反之，就衰敗灭亡。他用这种进化論証明：整个世界都是处在矛盾变

化的过程中，反对儒家的形而上学观点，并且指出：天是运动变化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天道变化，不主(专)政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

在《天演論》中，严复以天文学、地質学、生物学的丰富材料为基础，論証世界的物質性，指出：基督教說上帝創造世界，博士为人之說，“不可信。”（《天演論·导言一》）否認上帝是有意志有人格的万物創造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在《天演論》中，严复还鼓吹“与天爭胜”，強調充分發揮“人治”的作用，变法維新，救亡图存。他推崇荀子的“制天命”思想，贊揚荀子認為人們所以能战胜自然在于“能羣”的思想。他在《天演論》的卷終結語中，向人們呼吁奋发图强，“合同志之力，謀所以轉禍为福，因害为利”，并表示“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共同努力奋斗！

严复的《天演論》，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特別在知识分子中。許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喜爱这本书，受过它的影响。魯迅先生当时在南京水师学堂学习，他讀《天演論》，受到一位熟识的前輩的坚决反对，但魯迅“仍然自己不觉得什么不对，一有空閑，就照例吃倭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朝花夕拾·瑣記》）沒有几年，这部書就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中小学教师往往把它选作課文和作文題目，大大打开了人們的眼界和思路，起了广泛的影响。

（2）是实行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

頑固派和洋务派認為，三綱五常是孔孟之道，是絕對不能变革的。张之洞說，君为臣綱，所以“民权之說不可行”；并

說“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劝学篇·明綱》）他还認為，如果民权之說盛行，就会“紀綱不行，大乱四起”（同上），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使中国淪亡。用封建复古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反对君主立宪。美帝国主义的文化特务李佳白，也胡說什麼中国的君主专制“意美法良”，不必象西方那样实行“君民共主”（《新命論》），支持頑固派洋务派，维护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統治。

改良派同頑固派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論战。

为了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用“公羊三世說”作了論証。他說，历史是按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发展的。“据乱世”的特点是：有帝王君主，貴賤階級，一夫多妻，种族各別，实际就是封建社会。“升平世”的特点是：君民共和，虽有貴賤階級，但有平等政治权利，一夫一妻，种族逐漸同化，实际是指資本主义社会。“太平世”的特点是：沒有国家，沒有帝王，也沒有总统，并且沒有私有财产，实际就是康有为所設想的大同世界。他認為，当时欧美已經进入了“升平世”，而中国社会“仍守据乱”，应当发揚“自立自主之义，公議立宪之事”，并說，“若不改法，則大乱生。”（《中庸注》）要求清王朝統治者适应历史潮流，实行立宪，以防止大乱。

譚嗣同对“三綱五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認為，封建綱常是人們的“慘禍烈毒”。他揭露并批判封建君主提倡綱常名教，但他們自己从来就不講倫常。他說，皇帝的妃子多得无法計算，是“瀆乱夫妇之伦”。他又指出，所謂“忠”，就是忠君，实际是替君主掠夺人民的财产。所謂“貞节”，就是宋明理学講的“餓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簡直是酷刑，是把家庭变成監獄。他說，封建統治者所以要宣揚这些綱常名教，是为

了“箝制天下”（同上）。因此，他指斥封建帝王是烧杀奸淫，搶掠民財的“大盜”，是“獨夫民賊”。他要求“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仁學·自序》）他还說，不論君臣、父子、夫婦，都是天地之“菁英”，他們是完全平等自由的，用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思想，反对封建等級制度和君主专制。

严复以批判韓愈作为典型，对君主专制思想进行了批判。

前已述及，韓愈認為，古代人們所以能够从野蛮进到文明，都是由于圣人教給人們“相生相养之道”，如果没有古代的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因为人們不象禽兽，有羽毛可以避寒，有爪牙可以攫取食物。因此，他認為劳动人民必須供养剝削階級統治者，如果不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則誅”。

严复針對韓愈的封建专制思想指出：照韓愈的說法，所謂“圣人”，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父母、祖父母、祖祖輩輩，都必須皆有羽毛爪牙，“非人焉而后可”（《辟韓》），因为如果所謂“圣人”和他們的祖先是人，按照韓愈的邏輯，那么等不到他們成长，甚至等不到他們被生下来，早就被禽兽給吃掉了，他們怎能教給人們“相生相养之道”呢？并且他更进一步指出，如果人們在和禽兽杂居的时候，寒而不知衣，飢而不知食，那早就灭亡了，那些所謂的圣人，怎么向人們下命令，作他們的君主呢？因此，严复認為韓愈的說法是荒謬的，是“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同上）的君主专制思想。

严复援引西方資產階級的民約論，說人民为了“相生相养”，“择其賢者，立而为之君”，認為君主是被人們选举出来主持公道的君臣的产生，都是为了卫护人民的需要的，“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辟韓》）他还認為，如果能够实行君主立宪，六十年之

后，一定可以和欧美各国的富强相比，否则，可以用“乱政”的罪名治他的罪，“正吾莠言乱政之罪可也。”（同上）表现了他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强烈愿望。

（3）新学和旧学之争：

顽固派主张尊孔读经，提倡宋明理学、经学考据。洋务派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主张在尊孔读经的前提下，学点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帝国主义的文化奴仆李提摩太，也胡说什么“中国儒教”是“治国之道”，并主张汉学（经学）宋学（理学）清学（考据注疏）可以“各行其是，各适其宜”（《新政策自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提倡旧学，反对新学，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就是反对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中国的民族独立。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中，康有为的旗帜不鲜明，软弱无力；表现比较突出的是严复，他对封建八股、科举制度、宋明理学、考据词章等，一切被清王朝用来毒害和奴役人们头脑的旧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他批评科举制度和封建八股“锢闭智慧”、“败坏心术”，“滋长游手”（《救亡决论》）。他指出，科举制度要人们从小学习朱熹注的四书五经，玩弄词章，浮华虚伪，并把它们作为当官求俸禄的阶梯，只能培养出一批毫无实际知识，但知害民的“民蠹”。他批评宋明理学高谈义理而空洞“无实”，并且“师心自用”，“闭门造车”，从来不问是否合辙，符合实际，“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救亡决论》）这种情况，如不彻底改变，非把中国弄到亡国灭种的地步不可。

严复批驳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论。他指

出：“体”和“用”是就一个事物講的。有牛的“体”，就有負重的“用”；有馬的“体”，就有致远的“用”。所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如把馬的腿按在牛的身上，要牛有千里馬的作用一样，不但得不到千里馬，負重耕田的牛也失掉了。因此，他認為洋务派是“盜西法之虛声，而治中土之实弊”（《救亡决論》），結果必然使中国“不止貧与弱”，并且促使中国“速死”。

严复指出，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亲亲，后者尚賢；前者尊君，后者重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命，后者恃人力。他認為，要救亡图存，必須依靠西学，“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謀亦在此。”（《救亡决論》）

毛主席指出：“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論》）严复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就是反对封建文化，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

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頑固派洋务派的論战，在当时的中国，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在这场論战中，改良派具有严重的缺点。

第一，他們是庸俗进化論者。康有为認為，进化只能“渐进”，而不能“驟变”。严复也認為，进化虽然无穷，但“不可期之以驟”。（《原富》）他們只承認漸变，否認突变和飞跃，就是用改良代替革命。

第二，他們要求“兴民权”，又不肯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統治。严复認為，当时只能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共和，他說：“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辟韓》）梁启超說得